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四八期 ——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04d)

【运动记愧】	忏悔录二则	老 鬼
【痛定思痛】	儿女祭	姚蜀平
【追根溯源】	零距离采访王光美——“文革”爆发与毛、刘分歧	高建国
【研究动态】	首部文革通史还原最后的毛泽东——专访《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作者麦克法夸尔、沈迈克	张 楠·迪 扬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运动记愧】

忏悔录二则

• 老 鬼 •

◇ 我斗胡耀邦

他永远不孤单，他的好评如潮，他的威信空前绝后，他的名字万古流芳。——老鬼

日月如梭，耀邦一晃就离开我们二十年了。

我还记得大约是 1964 年，胡耀邦作为共青团第一书记在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长篇报告。当时所有渴望进步，渴望入团的中学生们都曾反复阅读和学习这个报告。我也如此，拼命地自我革命。那时候打心眼儿里以革命为荣，以革命为美，所以狠挖自己总跟人搞不好关系的根源，向灵魂深处的私心杂念猛烈开火，不断地、相互比赛地进行自我革命，自我揭发，自我批判。

我是学生，学习却不好。怎样证明自己革命呢？就特别渴望参军打仗。当“文化大革命”

来临之际，觉得考验和表现自己革命的机会到了。在运动中紧跟“伟大领袖”，紧跟“中央文革”，紧跟《人民日报》，为当个红色打手、红色暴徒、红色造反者而积极努力。

1967年初，在动物园旁的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了一场首都中学生批斗“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的大会。当时是中学红代会头头李冬民通知我们学校红卫兵的，要选派十来个人去担任押解“黑帮”上台的任务。因为我穿一身军装，比较健壮，荣幸当选。

记得耀邦是被一辆华沙牌小轿车送来的。他身穿一件黑呢子大衣，个子出奇的矮，大约要比我矮半个头，身体瘦小。下车后，他表情平静恬淡，挺着胸脯，在我们几个人的围簇下从旁门走进展览馆剧场后台。一路上他默默无语，就好像去上班一样从容不迫，镇定自若。

“三胡”他是为首的，要被第一个押到主席台前。我和另外一个红卫兵（记不清名字，肯定是我们47中的），各揪住他一侧脖领，攥着他一条胳膊，把他押到台前。随着他的出场，下面黑压压的中学生高呼口号。

到台上站定后，我们两个押送者就松开他的脖领和臂膀，让他自己独自站立，我们则站在他身后。耀邦默默地低着头，双腿站得笔直。我们看押者每隔二十分钟左右就换班休息，另外一批红卫兵上来接替我们看押。当时我们都是十六七的小伙子，站一会儿腿和腰都觉得累。耀邦他们三个“黑帮”却从始至终一直低头立正站着，其疲累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来自各个中学的代表一个又一个上台，义正词严地发言批判“三胡”。由于北京市各中学的工作组成员很多来自团中央，所以北京中学生对团中央意见很大，憋了一肚子怨气，就把怒火撒到了“三胡”身上……

这次批斗会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二十年之后，1987年初，当听到耀邦辞职的消息时，心里非常非常难受。这时候，我对耀邦已经有了新的深刻的认识。

我知道，1979年贵州有个“启蒙社”最先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贴出了大字报，揭露极左政策，被当时的公安部门认为反动组织。耀邦却主张用教育的办法，温和地解决这个组织问题，受到公安部坚决反对。

我知道，他曾秘密接见过“四五”天安门事件和西单民主墙下的活跃人物军涛和吕普。这两位都被公安局挂了号，属危险分子。一般干部都不敢沾他们，高级干部就更躲得远远了。在当时的中共政要中，耀邦是唯一接见过他们的中央一级领导。

我知道，他同情民众疾苦，积极大胆地为很多冤假错案平了反。比如江西赣州的李九莲问题、福建的地下党问题、河北的伊玛尼党冤案以及刘少奇、彭德怀等大冤案。当他向邓小平提出要给“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时，连老邓都没想到，有些惊讶地问：“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最可贵的是那“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之中还包括原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当初曾把挂职到陕西省委主持工作的耀邦整得死去活来，被迫灰溜溜离开陕西。但当刘澜涛被打成叛徒后，耀邦却毫无芥蒂地花大力解救他于水火。

我知道，他待人宽厚，从不落井下石。老红军，原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吴自立曾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干部会上当众嘲讽他，“我参加革命那阵，你还穿开裆裤呢”，把耀邦骂个狗血淋头。后来吴被打成“彭德怀分子”，1972年七十多岁了还遭尽毒打关押，特地给毛主席写信，派

儿子去送。儿子找到了耀邦。当时耀邦自己还没解放，却不怕犯“包庇彭德怀黑干将”的错误，也不计较吴自立与自己私交不好，积极帮助转交信件，终于改善了吴的处境。

我知道，他对老战友的孩子有情有义，所有受苦受难的老战友子女他都热情相助，从不刁难摆谱不理，他家成了落难子弟的庇护所。本人前妻之父曾涤原是王震部下，“文革”中被中组部郭玉峰迫害致死，孩子全流落外地。其母为孩子的调动费尽心血，找过王震，得到的却是一堆官话，毫无用处。无奈之中又托人把材料转给耀邦，耀邦当即批示将曾涤小女儿从广州189医院调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门诊部。

我知道，耀邦是个孝子，真诚善良，襟怀坦白，从不戴假面具，装模作样。听说父亲死后，他像个孩子一样在办公室里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新来的秘书推门进来，他什么寒暄话也没有，就是痛哭流涕，完全失态，令秘书大吃一惊，感到这个首长“不深沉”。

他曾经说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有，如此人际关系才能融洽。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人不设防，有时候那么单纯，一点不油，根本不像个政治家。这样的好人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真是一个奇迹。他在中国当代历史上顶天立地。

1987年1月某天晚上，从广播中得知耀邦辞职的消息，思绪起伏，心情抑郁，非常痛苦，为耀邦鸣不平。再没心思玩摩托车了，当即就把摩托车卖掉，以至于被老婆臭骂一顿。

这年年底《血色黄昏》出版之后，我感觉应该送给已经下台的耀邦一本，让他知道，当年在批斗会上曾经押过他的人，现在对他充满敬意和内疚。

中央大官，我的书只送给了耀邦一个人，当时也并没奢望能得到什么回音。1989年春，工人出版社给我转来了一封寄自广西的信，一个自称是耀邦老战友的女婿李洪欣在信中写道：耀邦同志在南宁的时候，闲聊时曾问我认不认识老鬼，我说不认识，但能找到他。耀邦说：请你转告老鬼，给我的书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真让我万万没有料到。

这是1989年春他逝世前所发生的事。每逢想到此，就无限的惆怅，无限的悲伤。耀邦多么平易近人啊，对我这样一个崇尚武力的打手，曾经押过他的红卫兵造反派，本可以置之不理却不置之不理，认真地托一个年轻人捎话。

耀邦的肉体生命虽然没有了，他的精神生命犹在。他自己曾说过：“我本来不是当总书记的材料，而是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特殊的岗位。”

但唯他这个总书记却干得最好，最得民心！唯有他这个当众痛哭，“不深沉”的总书记最受广大民众爱戴！他永远不孤单，他的好评如潮，他的威信空前绝后，他的名字万古流芳。

◇ 我告发了同学宋尔仁

文革前，同学们在私下相互交谈中，也都特鄙视向老师告密的人，虽然背地里有人干过这事，但在公开场合，告密总还是招人恨的，不光彩的。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只要对方是反革命、五类分子、阶级敌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对待。

检举揭发阶级敌人受到鼓励，告密也成了政治觉悟高的表现。那时候一切行为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可以理直气壮进行。因为革命至高无上。

我们北京四十七中高高三班同学宋尔仁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特别的人。他家住在门头沟煤矿。隐隐感觉他出身不会太好。因为他从不说父亲是干什么的，似乎刻意隐瞒。他喜欢文学，激动的时候，曾经在宿舍里大声背诵莱蒙托夫或普希金的诗。但有时候又特粗鲁，能说些矿工才说的那些脏话。对招惹了他的初中小孩，敢抽耳光，毫不手软，也不怕背上欺负弱小的名声。

无论团干部怎么劝，他也不申请入团，不靠近团组织。对班主任敬而远之，政治学习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一句话，他在班里属于比较后进的同学。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公开大骂女人。当周末，宿舍里没几个人时，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天底下最坏最坏的是女人！你知道吗？最毒莫过妇人心，比毒蛇蝎子都毒！”说这话时，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唾沫星子四溅。

当时正是青春期，对女性充满了好奇和神往。他这番言论，让我感到极其反常。心想，他肯定是在这方面受过伤，跟女的有过交往，被女的抛弃过，伤了心，才那么恨女的。一个高中生，小小年纪这方面就有了事，弄不好别是个流氓。再加上他对自己的经历，对老师或其他同学的想法很少说。让人看不透他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对他总保持着戒备之心。

他平时寡言少语，不爱在人多的地方说话。为人挺讲义气，自己吃点小亏，别人沾他点便宜，从不计较。

明知道不能以貌相人，但还是要受外表影响。宋尔仁喜欢梳个大背头，上唇留着一络小胡子，又是个三角眼，都让我联想到坏人。有一次借书，他原形毕露，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不好看法。听图书委员说，他要借一本《红与黑》，但学校规定这种书只借给老师，学生不借。图书委员好心给他另外借了本革命小说。他却勃然大怒，跟图书委员吵了起来。警告图书委员别把他当猴耍，借什么书用不着你管……眼珠子几乎要瞪出来，凶恶异常。

宋尔仁对积极要求进步的人都比较冷淡，对我却是个例外。那时候我想入团想疯了，成天扫厕所，一周写一次思想汇报。有人说我是“假积极”，动机不纯，可宋尔仁对我很好，觉得我比较直率。后来我又因为打了那位背后说我坏话的同学，挨了个记过处分，同学们都与我疏远，唯宋尔仁跟我见面依旧打招呼，不嫌不弃。他从家里带来的红薯、花生、瓜子总主动塞给我。上山摘来的白杏、酸枣什么的，也都给我吃过。

可我只是表面上跟他不错，享受着他对我的信任和友好。内心里对他却充满警觉，觉得他思想复杂，居心莫测，别被他拉拢腐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一个周末他回家了。宿舍里没有人，我坐在他床铺上，发现他枕头下面放着一本日记。出于好奇，我就偷看了。

那正是1966年7月份，工作组当政的时候。结果大吃一惊。他的日记里充满了对社会，对形势的不满。说什么“现在乌云笼罩着祖国天空”，“我们的国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人民在受苦受难！”……

好反动呀！他把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说成是“乌云密布”。

我当即把这本日记给了一个要好的同学看。他翻了几页后也斩钉截铁说：“绝对是反？动日记。”

我问：“怎么办？报告工作组？”

“对。”

于是我和同学一起很兴奋地把这本日记交给了学校工作组。同时很为自己过去对宋尔仁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而沾沾自喜。

工作组马上派人把宋尔仁从家里抓了回来，单独禁闭。并在大会上宣布宋尔仁书写反动日记，恶毒诬蔑我国的大好形势，诽谤文化大革命，隔离审查。

据知情者说宋尔仁最初表现很老实，蔫不出溜，终日埋头写检查交待。刚开始也没有人动手打他。直到某次，一喜欢拳击同学参加审问，冷不防给了他一直拳，力量很大。宋尔仁当时正坐在椅子上，被打了个后滚翻，从椅子上翻了过去。

就在那天夜里，他逃跑了。以后彻底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回学校。

可惜，我举报了宋尔仁也没当上左派，连军训也没资格参加。工作组把我留校，整日跟班上的几个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一起学习。

自从宋尔仁逃走之后，一晃多少年过去，我们班的同学谁也没有见过他。

流亡美国期间，倍感孤独和寂寞，经常回忆过去。宋尔仁的影子也常浮现脑海。我这才感到自己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宋尔仁。干的最缺德的事就是举报宋尔仁。

可能由于他住在门头沟煤矿，班里多数同学内心瞧不起他。我跟他同学三年，住同一个宿舍，吃同一个食堂。尽管他对我不错，数次为我说话，我却用两面派的手段对付了他。表面上和和气气，骗取着他的好感，内心却对他小心防范。

就因为他留着小胡子、三角眼、梳大背头，外表像个坏蛋；就因为他大骂过女的，可能跟女的有过什么事；就因为他对自己的出身躲躲闪闪不说。

啊，宋尔仁看错了我。我不像他想象得那么襟怀坦白，我一直对他笑里藏刀，起码内心深处对他的戒备就伪装得让他感觉不到。所以文革开始，我偷看了他的日记后就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工作组。自以为这是革命行动，自以为站稳了革命立场，自以为揪出了一个革命的敌人。

同学任道昂说我踩着别人往上爬。在宋尔仁这件事上确实如此。

30多年之后，当我写《血与铁》，想找宋尔仁核实情况，当面道歉之时，才发现他早已经不在人世。

据同学说他大约1968年初到了黑龙江省德都县黑龙江兵团一师六团。干过喂猪、种菜、采石等工作。平日寡言少语，没什么朋友。大约1974年娶了一个当地女人。他特别能抽烟喝酒，等到吐血时，才看病，但为时已晚。1977年因为肺结核病故于北京，留下一个儿子。

可以说，我交了他的日记本对他的杀伤是巨大的，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缺德的事。我对不起宋尔仁。

革命啊，革命啊，多少罪恶假你之名。

特写在此处，让世人知道，并恳请同学宋尔仁在天上的亡魂原谅。

□ 原载《炎黄春秋》，作者原名马波，自由写作者。

~~~~~

## 【痛定思痛】

### 儿女祭

• 姚蜀平 •

〔前言：12年前的1986年6月20日，远在美国应邀讲授中国科技史的一座大学的客座教授，我的小妹姚蜀平以贺思水的笔名写了一篇血与泪的祭文，献给文革中惨死的母亲贺定华和父亲姚剑鸣。她把埋藏在记忆中、内心处的母亲惨死的真情实况，在20年后才通过这篇《儿女祭》告诉她的哥哥、姐姐和少数世人，我们不情愿、不敢了解估计到的惨状，但没想到如此凄惨、恐怖、残酷。文革以后我失去了眼泪，即使在鞭抽、吊打、昏倒后又苏醒的孤独无望的夜晚，也没流过泪，但是读了这篇血的回忆，我的心像流了血泪，像尖刀扎进心脏。这不仅是我们一家五兄妹的《儿女祭》，也许这个小血滴反映的是同时代同命运的千万个不幸者——我们的同胞兄弟姐妹共同的《儿女祭》也是一个倔强而坚韧、永远不会被屠刀征服、不会被悲哀与痛苦压倒的民族的《儿女祭》。——姚监复 1998年11月1日〕

“姆妈！”我已经整整20年没有这样呼唤过了。就在我20多岁，大学毕业以后，每当叫起“姆妈”，我还会觉得自己是个小孩，一声“姆妈”的呼唤，会得到多少爱抚与温情。

可是，我再也不能这样呼唤了，因为母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20年前，1966年8月的北京，安定门外地兴居中国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家属宿舍里，在那腥风血雨中，在毁灭性的抄家之后，在用带钉子的厚木板毒打以后，在残忍地被砍断喉咙之后，我的66岁高龄的母亲穿着一身被打烂的旧衣服，光着一双青紫的脚，带着浑身的伤痕，顶着被零乱剪到发根的灰白头发的阴阳头，怀着无穷恐惧、满腔悲愤、疑惑和对五个子女命运的牵挂与无穷的思念与留恋，死不瞑目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一生在贫儿教养院、小学、妇联托儿所作教师的母亲，活活地在一个晚上被打死在年轻的中学生——红卫兵的手下，被扔到安定门内第六医院的停尸房。后来又被一些人扔到了大卡车上，和许多具同样遍体鳞伤的尸体一起，被送到火葬场火化。没有留下骨灰，没有半句遗言，没有也不许亲人最后送别，甚至没有留下一件像样的完整的遗物——能打碎的红卫兵都打碎了，能撕烂的都撕烂了，能抢走的都抢走了，……可是姆妈给我们留下无数美好回忆和做一个诚实的人，像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荷花的教导却又怎能打碎；姆妈的朴实、高洁、自尊与独立不羁的品格又怎能毁灭。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初期，首先触及灵魂与皮肉的是我的哥哥（中国农机化科学研究院工程师）和刚由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毕业生成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二院技术人员的我，我们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无情的斗争。但是，我们当时绝没有想到年迈退休、与世无争、年近七旬的父亲（1948年随地下党员廖运周同志为师长的国民党110师起义后，在湖北省建二公司工作）和母亲（一生作教育小孩的教员，1955年从上海市妇联托儿所退職）会遭到不测。

父亲是起义军官，1985年12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发出武字第299号起义人员证明书：“姚剑鸣同志，原系国民党陆军，于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参加起义，特此证明。”但是，父亲在起义前是国民党军需处长的历史，使我们全家日子的好坏全看当时的政治气候了。在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时，我们的日子同全国人民一样相当好过，像解放后我们五兄妹在“重在表现”的政策佑护下经过自己努力，都进入了名牌大学，分别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大哥姚监复）、南京航空学院（二姐姚一平）、苏联列宁格勒电工学院（三姐姚山平）、北京航空学院（四姐姚南平）和中国科技大学（小妹姚蜀平）毕业，分配在研究院所和大学作技术和教学工作。但是，碰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法无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全家的命运就相当悲惨。当红卫兵运动席卷北京城的8月，“出身论”的达摩克利斯利剑高悬在头上时，我们开始感到心悸，预感乌云将至，剑将落下。当时北京市大轰“黑五类”离京，远在锦州部队研究单位工作的三姐来信说，父母不能走，因为他们不属于“黑五类”。我们也用党的一贯政策衡量，党和政府一直按起义军官看待他们。退休后公安局还批准把户口迁来首都落户，农机院还分给房子住，当然不应算作阶级敌人或“黑五类”。可是，当北京市开始出现红卫兵打死人时，敏感的哥哥带着被打得又红又紫的双臂偷偷来到大姐家，向离开农机院宿舍暂住在那里的父母提出劝告，他预感到灾难的威胁，恳求父母立即回武昌原单位，认为父亲从1949年就一直在那里工作的原机关最了解他，相信湖北省建二公司的党组织知道在部队起义后，是作为110师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的父亲把廖运周将军的夫人、女儿和其他起义军官家属转移到解放区等事实，可能在这个时候回到武汉较为安全。母亲想想，默默点头同意了。可是没想到，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突然端起一个方凳，极为愤怒地猛地砸向地面，忿忿地喊：“我走！我走！我连累了你们！”我们只有沉默，把命运的选择留给他们自己。晚上，我和哥哥必须赶回机关，准备接受批斗，母亲拖着她那小时得了小儿麻痹症留下后遗症的跛腿，深情地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门口，她抚摸着哥哥被打伤的又红又紫的胳膊，像她一生遇到突发性危难时一样从容镇定，没有抽泣和哭喊，真情、坚决、清晰地说了一句话：“我到时候是会自己解决的……”我们有些茫然，不理解她怎么会冒出这句无头无尾的话，但是心里有些难过，更不会想到这句话就是她决心坦然地勇敢地面对厄运的最后遗言。

次日，父亲执意要回农机院宿舍拿一些日用品和换洗衣服，但是一去就不复返了，据说由地兴居的居民委员会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扣住了。母亲见父亲不回来，急得一夜没睡好觉，第三天的早晨，天一亮坚持要回去看看，也是一去不复返了。下午大姐给我打电话，急迫地要我到她家去。我满怀疑惑地立即赶到了大姐家，她告诉我，给母亲住处打电话（走廊上有个居民委员会的公家电话），不是邻居喊“姚大妈”的声音，而是居民委员会的人接的，凶极了，根本不准母亲接电话。一定是情况不好，所以不要我回母亲处。过去，每星期六，单身的我都回家陪伴双亲过周末，虽然这一天又是一个星期六，而我是不能回家了。后来，父亲说，当时在鞭抽棒打时，他和母亲不是想的痛不痛，而是最担心小女儿这时回来。晚上，我和大姐面对面坐着，干着急，苦熬着，突然穿军装在部队工作的另一位姐姐急匆匆地闯进门来，告诉我们：她刚回了农机院地兴居宿舍，一进大门，就感到气氛不对，正在开斗争会。红卫兵没有拦住这个穿军衣的女解放军，但是一位好心的邻居悄悄地、但是很严肃而坚决地对她说：“赶快走！赶快走！”我们心里明白，父母极可能是在斗争会上，否则用不着叫姐姐走。三姐妹在焦急中从傍晚苦熬到清晨。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想等哥哥一起商定如何送走父母的大问题，哥哥应该设法再从“监督检查”的看管室中溜出来共同商议。可是，又是一整天，从早到晚，渺无音讯，父母那边更是不知实情，又不敢轻举妄动，真是心乱如麻。后来才知道，哥哥那天早晨就由两个农机院的红卫兵押送给地兴居外馆中学的红卫兵，脖子上挂了一个大牌子“反革命分子姚监复”，他和被抓去打得背上体无完肤的父亲分开来进行残酷斗争。直到半夜12点，农机院红卫兵乘着卡车来，一看哥哥还活着时，大骂：“他妈的，老子来收尸，你还活着！滚回去！”只是由于一位红卫兵的头脑清醒，认真思考了哥哥在残酷拷打后拒不认罪的答辩：“我有什么反革命罪行的事实？如果他们告诉你们具体事实，你批斗，我认罪。如果没有事实，只挂一个牌子，就斗死，

会不会有人借刀杀人？”因而，没有斗死哥哥，他捡了条命在卡车上跪着“滚回”农机院了。这样的一天，他怎么还能见我们？

星期一，我必须去机关上班，参加批判会，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的教育。正是在批斗大会的会场，忽然广播里叫到我的名字，通知我马上回家。我预感到已经发生了什么事，匆匆向家里赶去。路上迎面遇到一位妇女，她边走边强忍着哭泣，这位看上去是高级知识分子夫人的痛苦脸色更增加了我心中的惊慌和担心。

我急匆匆地奔上了农机院宿舍北楼二楼，扑入眼帘的是一走廊的人群，紧紧围在筒子楼厕所对面父母住的一间小房子门外。

一个身穿旧的黄军装，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坐在我家门口的小凳上，执行守卫任务。他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验明我的身份以后，他准许我进入自己的家门，还说：“你们挑吧！还有什么要拿的，可以拿走。”

我进屋一看，心像被刹那间扔进了冰窖，全身都缩紧了。啊！这是什么景象啊！没有一样站立的家具，没有一样完好的东西，没有一张没有撕裂的纸片、古画和照片，没有一件没有打碎的器物！从三姐由苏联带回的手风琴到床上的被褥、枕头，从书报衣箱，从我放在父母处的每月工资的银行存折到母亲珍藏几十年的翡翠结婚戒指……统统地抄走了。15平方米的地面上，满满地覆盖着那些被撕碎、被打烂、被砸坏了的东西，我的一生从没有见过比这15平方米更加凌乱、更加凄凉、更加沮丧、更加惨痛的地方。我的哥哥、姐姐都先来了，他们蹲在地上翻着、拣着，我也随着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这似乎被千军万马践踏、蹂躏过的15平方米的水泥地上翻找着，实际上我们不敢互相看到对方的眼神，怕充满眼眶的泪水流出来，怕哽咽在喉咙里的哭声哇的一声爆发出来，都低下头来凝视地面。当我们翻出半张还能看到父母和参军的姐姐们的军装照时，盯着我们行动的外馆中学的红卫兵立即把这些撕得粉碎的照片抢过去，再用力地撕成更碎更碎的碎片；我们又从乱纸堆上发现能留下父母墨迹的半张信纸时，又被红卫兵夺过去，再撕成更碎更碎的碎纸。在我们兄妹低着头忍着悲痛在地上翻着、门外堆着几十人在看着时，突然进来一个似乎是重要人物的红卫兵，这是个女的，也只有十几岁，长得十分清秀。我迷惘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如此清秀的面容同如此凌乱、凄惨的15平方米的地面联系起来，但是现实的因果关系的无情事实使我自从那天以后，一看见这种类型清秀的脸庞，就会想到难忘的15平方米地面，而不由自主地会有种要呕吐的感觉。这位可能是这场悲剧的前台指挥的女红卫兵正式向我们五兄妹宣布：“贺定华（即我们的母亲）死了，现在第六人民医院，由你们去处理后事。姚剑鸣（我们的父亲）在后楼，尽快要他滚回老家农村去。”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被证实了。我的泪水一下子充满了眼眶，但是我知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不！绝不能哭！哭会带来大祸。我深深地低下了头，翻弄着地下的破碎纸片，可是一切都模糊了，我强忍着，不让一滴泪流出来。

哥哥更惨，胸前还挂着一个“反革命分子姚监复”大黑纸牌子，实际上他只不过贴了农机院领导的几张大字报。他立正站着，旁边还有两个农机院红卫兵押送着、监管着。到了这个时候，哥哥还没有失去冷静，提出了一个我们正想追问的问题，他似乎忘记了脖子上“反革命分子”牌子的分量，眼睛盯着女红卫兵问道：“我母亲贺定华是怎么死的？我们要去派出所销户口，要向他们报告死因。”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似乎难住了这位清秀的很年轻的女孩，她没有也不敢如实回答，而是轻声地似乎理不直气不壮又装作满不在乎地说：“高血压。”我们心中非常明白，母亲一生从来没有高血压！但谁敢开口呢？到了这个地步，勇气、尊严、真理、正义、事实，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哥哥多年后一直在后悔，当时没有请这位清秀的姑娘把她的话“高血压”和她的名字写下来，当时是去派出所销户口的书面凭证，今天可送给巴金建议的终将建立的“文革博物馆”保存。派出所的警察在哥哥注销母亲的户口时，不想问死因，而按照红卫



兵要父亲“滚出北京、回农村老家”的“勒令”，哥哥要迁出父亲户口时，反问：“要把姚剑鸣的户口迁走吗？”

当晚，我们把父亲从后楼扶到这间满目疮痍、空荡、杂乱、悲凉的房间里，拨开地下的玻璃碎片，把唯一砸不碎的棕床板（这还是父亲退休后从武汉带到北京的）放在水泥地面上，费了大劲用酒精分开血迹斑斑的粘连在父亲背上的血衣，用嫂嫂悄悄买来的红药水搽抹他背上的几道深达1厘米的伤痕，似乎麻木的他，不喊疼，只关心他的五个子女和陪伴他34年的苦命妻子怎么样。我们嗯嗯应着，把一包破棉花当枕头，扶着父亲慢慢地躺下来，睡在地面上的武汉棕绷床板上。买了一些点心给他吃，他也不知道多少时间只挨批斗，没有进食了，据说几天中只有一位胆大的好心的邻居，烧过一点稀饭给他吃过，他没有心思和口味吃东西，而是不断地反复追问：“你姆妈怎么样？”我们只好骗他又不是骗他地告诉他：“姆妈在第六医院。”他还关心着更可怜的母亲：“她还在医院吗？”看见父亲遍体鳞伤、衰弱不堪、精神恍惚，不断地喃喃自责：“我害了你们！我害了你们！”谁也不忍心告诉他真情，只是嗯嗯地答应着。我在静夜里亲耳听到他清清楚楚地对我不断地诉说的一句话：“我们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这句话多少年来在我耳中震荡，因为它是那样哀怨，那样催人泪下。也许他想到的是在1932年白色恐怖的国民党首都南京，冒着生命危险，让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在家里“打麻将”，而来的人、谈的事他是心里有数的，在黑夜里雇马车穿宪兵司令部的军装将市委书记的夫人，被通缉的市委负责干部送到下关轮船码头安全地逃出虎口；也许他想过把在黄埔军校时有周恩来讲的资料藏在农村小阁楼里，解放后交给党组织，他还给一些离家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朋友的生活困难的家属予以经济接济，从未想过再要什么报答，也许他想过潜入敌营20年的廖运周同志，廖率领110师起义前，他曾协助工作，起义后转移家属，将军用物资按廖运周密电发往准备起义的张轸部等等。他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文化大革命”不承认，红卫兵小将不承认。如果他天上有灵，知道刘少奇主席、彭德怀、陈毅、贺龙元帅做的好事之多、功劳之大，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命运之惨，对自己的“做多少好事也没有用”的哀怨就会找到更多的知音和共鸣了。次日，哥哥继续被勒令“监督检查”，接受批判，无法自由行动，大姐准备送父亲去武汉，然后回安徽宿松原籍。只有作为小妹妹的我一个人，去医院处理母亲的后事了。

我战战兢兢地找到第六医院，又心惊胆战地找到停尸房。管事的老头恶狠狠地问我：“怎么死的？”我小心翼翼地按照女红卫兵的答案说：“高血压。”他说：“嗯。一会儿火葬场来车。等着吧！”不一会儿，火葬场的大卡车开到了。当工人们把母亲尸体抬出来时，我快步地跟在旁边走，急切而悲伤地凝望着母亲，心却要哭出血来了。我清晰地看见母亲穿的是一身破旧的陪伴她数十年的香云纱衣裤，黑色已洗成黄色了，膝盖处还打着补丁，赤着脚，手臂和两腿上都看得出明显的伤痕。头发更是被剪得不成样子，有的地方齐发根没有了，有的地方留下几绺长发，却让血迹粘连在一起。而她的头，却是偏在一边……

当她被工人扔上卡车后，我不由自主地蹬上了司机驾驶舱旁的踏板，伸头向卡车里探望，想最后再看一眼我的慈祥、和蔼、欢乐的母亲的脸。不期想母亲被那些这几天不知抬过多少具尸体的火葬场工人扔到了车厢的最前面。当我从上往下看时，母亲的脸孔竟然就在我的眼皮下……离我不到两尺！啊！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的颈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痕，她是被砍死的！是他杀？是自杀？不知道！至今不知道！！我还看清了那一头剪乱的白发、那满身的伤痕……正在我处于极度恐惧和悲恸不已的时候，突然身后传来了一声吼叫：“是斗死的！什么高血压？是斗死的！”我被吓得一下子从踏板上蹦了下来。面前站着停尸房的那位恶老头儿，正气势汹汹地向我咆哮。突然间，一股怨恨从心底升起，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和力量，一改几天来的低声下气，我竟然也跳起脚向他声嘶力竭地吼道：“我怎么知道？！他们告诉我的！我去问谁？！你说，我去问谁？……”本能的愤怒和反抗把我从一只任人宰割、侮辱的羔羊变成像一只要张口把他吞下去的野兽，恶老头没料到这一手，竟往后退回去了，同时嘴里还不断地咕嘟着：“什么高血压。斗死的！”

我怀着满腔的悲痛和怨恨在医院送走了母亲，她是孤独地没有亲人陪同被拉运到火葬场的，在那个时代是不允许我随车前往送葬的。我在运尸首的灵车远远逝去以后，立即转身向火车站奔去，想最后见父亲一面——这果真是最后的一面。我在月台上找到去武汉的列车时，父亲已坐在车厢里，他傍着窗口低声地亲切地唤着我的小名，深情地嘱咐我：“以后要听哥哥、姐姐的话啊！”隐含着他对自已的命运和前途的绝望，似乎已将他的父辈保护人的责任转交给我的哥哥、姐姐了。我强忍着泪默默地点着头，凝望着他。车窗外，我们旁边是几个十来岁的孩子，像我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车上的一对落难的老人，我猜想，一定是他们的孙子、孙女，来送被轰出首都，和父亲一样被遣送回原籍的他们的爷爷、奶奶，不知道他们的父母亲为什么没有来送行，是不是也遭到了不幸的打击。我们这些命运相同的天涯沦落人，都在强忍着眼泪和哭泣，都有无数想说、要说的话，但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或者是一句也不敢说。在站台上沉重的沉默的哀伤气氛中，汽笛响了，火车开动了。我最后在车窗外面对父亲喊出声：“爸爸，保重——”我随着慢慢驶离北京的车厢向前走着，死劲盯着是生离但不愿是死别的父亲的眼睛，在父亲依依不舍的目光里，我看到的是闪着惊恐、胆怯、忐忑不安和为我们担心的神色，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终生不会忘记的最后的印象。

走出火车站，我仍然赶回到那间似乎已被千军万马报复扫荡过的] 5平方米的小屋里，这里曾是我的父母亲住了3年的温馨、亲切的自己的家，现在，我孤单地站在真正是家破人亡的废墟之中，悲愤、怅惘、茫然……我不期望还能找出一件可以留作纪念的遗物。小屋散发出阴冷、混浊、悲惨、凄凉和恐怖的气息，似乎还能依稀看见在毒打、逼供时的母亲，她宁死不屈，绝口否认诬陷她是什么“特务”之类的不实之词，为了保护自己的清白和子女的命运忍受了酷刑和死亡的威胁，整个漫长的文革期间，任何专案组拿不出一句母亲招供的话来打击她的子女。她以生命保护全家免遭最恶毒的毁灭性的打击、挫败了企图从66岁老妇人打开缺口承认是“特务”，再炮制星期天与子女聚会是“布置特务任务”的恶毒计谋。她只是一个善良的，纯洁的、普通的小学教员和像普天下同样热爱子女的母亲，只；是从小就懂得做人要像出污泥而不染的素洁的白莲花。

我不敢在这间失去了温情，却充满了杀机与恐怖的小屋再停留了。我环顾四周，还有一件血衣和一个破木盆是没有被完全撕烂，砸碎的。这件从父亲身上用酒精与伤口剥离开来的血衣，仍放在地面的棕床板上，我没有胆量把它拿走，但是我把它放在全屋最显眼的地方——不论谁再开门走进来或者任何人走过这间房门口，都会看到这件血衣，都会想起含冤逝去的老人。然后，我提起扔在墙角的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木盆，这是母亲从南方带到北京的红漆脱尽了的旧木盆，也是全屋中唯一一件历经劫难尚能保持原状的家具。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永远离开了这间终生难忘的小房间。

我回到了大姐家，把母亲用过多年的小木盆放在旁边，尽情地洗了洗奔波了整整一天的又脏又疲倦的脸。当我抬起头来从镜子中看到自己那张麻木而毫无表情的面孔，从我的眼光里又看到了与母亲死别、同父亲生离也或为死别的悲痛情景……我突然按捺不住地哭了，我的两肩不停地抽搐着，强忍了一整天的眼泪终于再也忍不住了……

父亲由大姐送到武汉后，才被告知同他相亲相爱35年的母亲已不在人间了。他抱头痛哭一场后，决心离开大城市孤身一人回到安徽宿松农村的老家，在屋后小山上长眠着我们的祖母、他的母亲。在寂寞、孤独、胆战心惊中他极为痛苦地生活了两年。他无时不牵肠挂肚地惦念着仍在被批斗、下放和不断接受再教育的五个子女的困难处境和未来命运。他终生自责：“是我害了你们！……在30年代白色恐怖的年代我要求加入共产党，我们帮助逃出南京虎口的党员对我说：‘你的孩子多，加入组织危险，不入党也能做很多工作帮助党。’但是，最后我还是给全家带来了灾祸。”他也深深地向我叹息：“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终于恶运降临了，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高潮中，农机院的专案组两人不远千里找到了安徽大别山脚的小村庄，对父亲进行了一场相当有力的“谈话”，专案组告诉他，他的唯一的儿子、我的哥哥由于他的朋友、同事揭发他说了江青的坏话，已经被农机院革委会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了，他自己也将在次日公社大会上被批斗，这样的当头棒喝使他在极度恐惧、担心绝望与悔恨中自缢谢世了。他被逼上了失去任何幻想与希望的毁灭自己的解脱之路。他的忍受煎熬痛苦的能力超过了常人能承受的极限。他的最后日子是怎么度过来的，他是不是想给自己的子女留下最后的遗言，他的遗容会不会带着母亲同样的无穷恐惧、愤懑、疑惑，对子女未来命运的惦念、死不瞑目……远在天边、分布四面八方的我们五兄妹不知道，看不见，但是我们从母亲的死亡能清楚到知道和看见父亲的死亡。多年后，我的哥哥在后山的矮松林中，跪在被乡亲们埋葬的没有碑文的父亲的墓前，把我写的《儿女祭》和五包香烟，五个苹果，作为五个子女的奉献给父亲和母亲在天之灵。乡亲们不忍心把父亲最后日子的惨状告诉哥哥，只有一位90多岁的老姑妈一只手紧紧地握住哥哥的臂膀，另一只手轻柔地抚摸着已经60岁，年龄与当年回老家的父亲相仿的哥哥的微秃的头顶，深情地盯着哥哥的眼睛不断地说：“像啊！真像你爸爸！”突然不断地极为痛苦地抽泣起来说：“你爸爸真可怜啊！可怜啊！可怜啊！……”

老姑妈90多岁了，但是她的手，不知是由于同情、悲痛还是愤恨，把哥哥的手攥得那么紧，那么痛，她的“可怜啊”的哀鸣把哥哥的心，把我们五兄妹的心上多年尘封的深深的伤口打开了，心在痛、在哭、在流血……

父亲和母亲一样，没有为我们五兄妹在临终前留下一句遗言和一件遗物，也没有一个子女能在最后告别人间的父母遗体前放声痛哭或低声抽泣，但愿有天堂，使先后离开我们的父母在那里相会，互相照应，忘记对他们不公正的痛苦的人间岁月。

多少年了，多少个难眠的夜晚和难挨的白天都过去了，我没有去扫过墓，甚至父母遭厄运后，连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都未曾有过。太多的泪水与悲痛都压在心底了，泪早化为血了。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了20年以后的今天，1986年6月20日，我怀着许多美好的和悲哀的、含着微笑的和含着泪水的回忆，用墨水也是用心血写下这篇祭文，愿它化为一股青烟，给在人间受尽折磨、痛苦如今定在天上的母亲和父亲，带去儿女的一片真情与心意。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我们永远不会也不可能忘记你们。我们更不会忘记你们所经历的，也是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文革”的这场苦难。中国正在变，我们和全中国人民一样，希望自己的伟大祖国变得更美好，因为我们绝不愿意我们的下一代再受这样的苦。姆妈，你听见我又一次这样呼唤你了吗？安息吧。姆妈！我要在你这个对我最尊敬最慈祥可爱的普通人的名字——贺定华的后面，写上用在那些逝去的伟人的名字后面的4个字“永垂不朽”，刻在我们五兄妹的心碑上。

1986年6月20日

□ 原载《思痛母亲》，者永平、关圣力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版

~~~~~

【追根溯源】

零距离采访王光美——“文革”爆发与毛、刘分歧

• 高建国 •

一位非凡的中国女性——王光美，2006年10月13日在北京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

我曾深入采访王光美。有许多令我惊愕、感慨并难以忘怀的素材，还从未在我以往发表的

文章中披露过。我觉得有责任补写一篇文章，既是对那次采访的追记，也作为对逝者的纪念。

◇ 王光美取消了不见面的决定

八年前（1998年），一个泛着凉意的夏日，我在北京一家内部招待所，拨通了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住宅的电话。未等我开口，一位操着京腔的年轻女性已在发问：“喂，请问找哪一位？”“我找王光美同志……”我说明了身份与来意，希望予以通报。然而，令我惊异的是，这位“年轻”的接听者，就是年已七十七岁的王光美本人！

王光美委婉而坚决地表示，她只能在电话里接受简单采访，因为她患肺炎，尚未出院，今天只是回家来取些东西。于是，我便在电话里匆匆展开访谈。

“由于刘主席非常喜欢别人称呼他‘少奇同志’，请允许我也使用这个称谓，并称呼您为‘光美同志’。”我这样开了头。

“好啊。多少年没听到这样亲切的称呼了。”王光美高兴地说，“你想问什么呢？”

“我想请您扼要地谈谈，少奇同志冤案的形成和平反，以及您的有关感受……”这是聘我为特约撰稿人的报社，预定的采访题目。

“原来你想谈这方面的事儿。”王光美的声音明显地低沉下去，她似乎想回避这个话题，“你的题目太大了，我需要准备一个月。”

“那么，请允许我请教一个‘文革’史至今没能说清的问题。”我临时放弃了采访提纲，想解开一些历史之谜。“少奇同志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文革’浩劫要在中国爆发了？”

“这个……”王光美犹豫着，没有回答。

“当毛主席1962年秋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口号时，少奇同志是否意识到，斗争风暴不久将在党内刮起？”我追问了一句，搞专访只能这样抓机会。

“你对党史很熟悉嘛，还能说出这是在那次全会提出的。”王光美巧妙地绕着弯子，仍然不作回答。

“我专程从上海来采访您，当然做了充分准备。”不管怎样，来自王光美的夸奖使我相当惬意。

谁知，她马上提出了批评：“不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并不是毛主席提出的，这只是一种概括性提法。主席的原话是‘阶级斗争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

“您的严谨使我知道，您当年担任少奇同志的秘书，是怎样一种工作状态了。”这倒不是恭维话，是我感慨之余的由衷之言。

“你写给我的那封信，为什么不用电脑打字呢？”王光美跳换了话题。

“手写显得郑重一点吧。您能看清楚吗？”我难以判断她对我那封有些潦草的求见信，是什么反应。

“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记者手写的信件了。你这封信，写得很认真，在措辞上也比较严谨。”

“这是因为，我想认真真地对您进行一次采访。我觉得，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文革’，和它留给后人的永久教训……”

“哦……你说得对。我接受你当面采访。”王光美改变了决定，“我提前出院吧。我在北京

医院已经住了半个月了。我的肺炎其实已经大好了。过两天，就在我家里谈……”

王光美与我约定了见面时间。她并在电话中，又兴致勃勃地谈了一些对刘少奇研究的看法。

◇ 王光美接受采访有交换条件

两日后，一个风和日煦的下午，我来到复兴门外一幢公寓楼内。王秘书给我开了门，小保姆给我送来茶水。不大的客厅朝南，布置得整洁朴素。不久，身穿浅灰色竖条棉布便装的王光美便含笑而至。

王光美虽然已是黑白参半的头发，仍然洋溢着活力和热情，眼神中露出和善、也透出机警。

我看窗外日光角度颇佳，便请她站在摆设着插花与盆景的窗台前，让我拍一张照片。她半开玩笑地说：你得寸进尺啊，这可不在约定的访谈范围内。结果却是我给她拍了照片，她又让秘书给我们拍了合影。

秘书告退后，我拿出笔记本。王光美微笑着连连摆手，打断了我的发问。她说：我知道，你着急地要和我谈少奇的事。可我还是要先和你谈谈中国贫困母亲的事。你得答应我，在文章里包含这个内容，让大上海的读者也知道贫困地区的状况。

我一边应诺，一边半开玩笑地说：这是您支持我们工作的交换条件吧。她笑而不答，径自拿出一份材料，让我“仔仔细细摘录”。

〔下略——编者〕

◇ 王光美和江青的奇特关系

回到共和国第一大冤案——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主席刘少奇冤案，我的切入点依然是：刘少奇究竟什么时候才知道，“文革”要在中国爆发？这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中，既隐藏着尘封的历史之谜，也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

王光美回答这个问题时，激动的情绪难以掩饰：“‘文革’要爆发，少奇他事先完全不知道。”

王光美的这一说法使我十分惊异。须知，自1953年起，中共中央便分为一线、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虽然不少重要决策，仍由身居二线的毛泽东主持作出，但在决策程序上，特别是1960年代，一线实权大大扩大的局面下，毛进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难绕过刘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

1960年代的格局，具体说来是，刘少奇在总书记邓小平协助下主持党中央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也要向刘请示。刘只有重大问题才向毛泽东报告，请毛发表意见或作决断。倘若毛不在京，除极其重大的问题外，刘可与在京常委商议后，对任何问题当场拍板（情况紧急时，可相机进行终结决断）。

王光美对我说：从延安到北京，中共中央就形成了这样的惯例，“主席不在，少奇代。主席、少奇都不在，总理代。……总得有人坐镇么。”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发动“文革”的呢？或者说，毛泽东是怎样越过中央一线，掀起对党

内“走资派”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呢？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察觉政坛上有一些异常动态，是江青1963年突然重新关注文艺工作。

而这一特别信息，来自江青与王光美这两位主席夫人，讨论服装穿戴的一次谈话。

1963年春，王光美将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等四国。由于外交部礼宾司的俞沛文司长坚持，刘少奇便批准王光美到上海定制一些出国服装。那时，江青恰巧在上海。江青便用“内行人”的口气指导王光美：服装穿戴嘛，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般高雅，不要搞得珠光宝气（笔者注：从未以第一夫人身份正式出访的江青，在“文革”中带着哭音咒骂王光美：我叫她出访四国不要戴项链，她偏要戴项链，一点不听我的！其实，江青那次在上海，只是劝告王光美不要别胸针，并未提及戴珍珠项链的事）。王光美向来敬重第一夫人，便谦虚地表示，她将尊重江青的宝贵意见。

江青对王光美说完她对出国服饰的见解，便一个劲指责中国文艺界搞“封资修”，情况已经如何严重；甚至胡说文化部副部长、著名左翼作家夏衍，历史上是个“叛徒”……王光美返回北京后，便向刘少奇一五一十汇报了江青的可怕言论。但是，刘少奇并不认同江青的“奇谈怪论”，对江青也显得满不在乎。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对江青，一贯都是既关心尊重，也不在乎。王光美对此具体解释：“因为有明确规定，她是秘书”。“她以前是不怎么出面的”。“毛主席一直是管她很严的，不是随便的。她有时随便地对我说什么，主席马上给我打电话说：不该说，说得不对。”

王光美用一句话概括了江青的性格，“我如实说，她是个听了风就是雨的人。”

对于江青这种“听了风就是雨”的“来事儿”性格，王光美给我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这得从毛泽东1961年写的诗词《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说起。

1961年，国民经济因大跃进失败而陷入困境，为了防备外敌趁机入侵，各地加强民兵训练。这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身边的女机要员小李，到菊香书屋去给毛送文件。小李将离去时，毛泽东问她是否已参加民兵。小李便把自己持枪而立的操练照片拿给毛看。毛看后十分高兴，便在地理书的空白处挥就一首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毛泽东把诗送给小李时说：年轻人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哪！

王光美说，江青“她是夫人，当然看见这诗了。我是少奇夫人，她就跟我也说了”。当时，江青对王光美就是这么友好。然而，令王光美和中南海诸位夫人瞠目的是，江青“从此就不穿从前的裙子了。而她过去……衣服很讲究的”。

江青不穿裙子只是第一步，接着在服装上又出了新花样。王光美告诉我：“你以后看到她穿军装的相片了。她这不是从‘文革’开始的，从1964年就穿了。毛主席在十三陵看三军大比武时，她已经穿军装了。”

以后，江青便经常穿着崭新的军装出入中南海，并参加各种活动。不过，军装上没有帽徽和领章——总参谋长罗瑞卿作了限制。

第一夫人换穿军装参加活动，红墙内其他夫人怎么办？王光美只好去问刘少奇。刘少奇的回答既简单又明了：你们这些人又没有参军，穿军装做什么？江青她要穿军装，随她去好了。

江青换穿军装，仅仅由于“听了风就是雨”的性格使然么？王光美讲述的这个历史小故事，使我生出一些疑惑：这后面还有什么政治隐情？因为，毛泽东曾对外宾说，1964年夏天（正是江青换穿军装观看大比武的那个夏天），他同刘少奇的斗争开始了。总之，毛泽东这次大力支持江青对文艺界的指责。而国防部长林彪也在江青要求下，于“文革”前夕介入对文艺和意识形态的大批判。

时至1966年8月，“文革”风起云涌之际，建国后首次穿上军装的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检阅百万红卫兵。

◇ 刘少奇不留情面批评江青

王光美接着向我讲述了江青以“文艺哨兵”的名义，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曲折经过。

为了理解王光美作为历史亲历者的简要叙述，必须对历史背景作些介绍。

史料证明，自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集体，对文艺与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何种政策，出现了鲜明而深刻的分歧。

1962年4月，刘少奇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以中央的名义批发中宣部“文艺八条”，提倡文艺题材和风格多样化，反对党包办文艺。文艺界众人欢呼，要把这“八条”刻在石碑上。

1962年12月，毛泽东根据江青的提醒，对文艺界发出警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

1963年9月，毛泽东再次发出警告：“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那个东西不行”；“要推陈出新”。

可是，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在鼓励现代戏的同时，并未封杀传统剧目。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政策，和一线领导人制定的政治、经济宽松政策一样，继续在全国静悄悄地推行着。

正是在毛泽东越来越感觉失落的1963年，江青以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闯入文坛，开始向中央一线领导发难。江青曾在上海向王光美挑明：“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如果把政治玄机说穿了，毛泽东推出江青去插手文艺，既是一种可进可退的党内斗争手段，也可涉及价值观念等大问题。

王光美一边回忆，一边对我说：“江青从此以后抓文艺，抓什么对封资修的批判，搞现代样板戏。把上海来的沪剧《芦荡火种》，改为京剧。主席把它叫作《沙家浜》。……《红灯记》原来是东北的《自有后来人》，也给改了（笔者注：王光美这样讲，大概由于刘少奇1963年曾应周恩来之请，对哈尔滨根据长春电影厂影片《自有后来人》改编的京剧，提过史实修改意见。而江青移植的主要依据，则是上海根据该影片改编的沪剧《红灯记》）……改成京剧《红灯记》。江青只不过是看了，听了，她就把这个作为她的本钱”；“江青也许改了一两个字，因为她会京戏啊。”

王光美告诉我，由于江青在抓样板戏时，对文艺界批评既多且厉，“中央就听了江青的汇报。少奇找她谈了，问她究竟有什么意见？因为，文艺是很复杂的事。但她没怎么说话。后来，中央在怀仁堂开会，请江青出席”。

刘少奇与江青单独谈了些什么？由于没有留下记录，如今已无案可查。王光美只知道，刘少奇批评了江青，在上海与王光美谈文艺界各种问题是不负责任，以后要注意。而江青在“文革”中的“批刘发言”，也透露了端倪：“我对刘少奇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我向他汇报文艺界的那些污七八糟的事，他却不表态。”

刘少奇于1964年1月主持的那次“中央文艺工作会议”，留有不少史料。

虽然这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又根据江青提供的材料，对文艺界作了异常严厉的批示（史称“第一个文艺批示”），指责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改造“成效甚微”，并怒声质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艺，……岂非咄咄怪事。”但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非但大事化小，把毛急于解决的“主义之争”，降格表述为：“就是颂古非今的问题，还有颂洋非中的问题”，并再三赞扬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的“意见好”。周扬的意见是什么呢？周扬强调：文艺界的问题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大跃进时期领导文艺的方法简单粗暴，现在不能仿效。江青在会上当即反驳：“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东西更粗暴！”可是，几乎没有人理睬江青。邓小平在发言中明确表态：我完全同意少奇、周扬的讲话。这样一来，文艺界就只需改进工作，而没有掀起批判风暴。

更有甚者。中宣部长陆定一与周扬，对江青已数次要求批判、并说明毛泽东也认为“很坏”的剧本——吴晗编写的京剧《海瑞罢官》（被江青指控与七千人大会后的“单干风”等有关），依然采取顶着不办、“欠债不还”的态度。而毛泽东对江青去中宣部“管文艺”，召集部领导开会，早已对周扬发过话：“江青看问题很尖锐哩。”江青也曾向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当面说明，“我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我来管文艺的”。中宣部一再表现出的强硬，使毛泽东产生了中宣部有恃无恐的感觉。

不仅如此。王光美还曾根据刘少奇对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批示”的反应，在个别场合议论：“据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来自中央一线最高主持者办公室的这一说法，也不见得未被毛泽东获知。

正当毛泽东对刘、邓等人公然庇护有“大问题”的文艺界，颇为不悦之时，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

◇ 江青抢当“新的知名人士”

1964年2月3日，距刘少奇主持“中央文艺会议”恰好一个月。并未感到形势十分严峻的中国剧协，举行千人迎春晚会。会前发函希望来宾讲究服饰，女宾以裙子为宜。场内不设政治标语。谐趣节目有男演员穿芭蕾舞短裙跳《天鹅湖》，梁、祝拥抱等。舞会里称“女士们、先生们”，还跳美国水手舞、伦巴……《解放军报》编辑顾工，本着“战士的责任感”，向中央揭发了“文艺界的糜烂风气”。

此事顿时激起天威震怒。毛泽东于2月13日（大年初一）亲自发话：“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毛泽东并于当年6月27日，在江青提供的中宣部整风报告草稿上，以他特有的尖刻语言

砸下重锤：文联各协会“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毛泽东并以“最近几年”积累的感受指出，文艺界如不改造，就要成为吸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发动政变的舆论基地。

王光美对毛泽东这个批示（史称“第二个文艺批示”），并未多加评论，只是告诉我，毛泽东那时还有一条“在文艺界培养新的知名人士”的指示。这样，就使江青萌生了她自己来当“新的知名人士”的野心。

王光美的叙述主线，依然建立在江青的政治表现上。她说：“1964年夏天，江青听主席说，要培养一些新的知名人士，她从此就抢着出风头。她想冲。所以，‘文革’后批她想当女皇。她当然听到一点什么新精神了，她就从她个人那里发挥。”

王光美说，江青在文艺界“冲”的时候，最重要的“发挥”，不是随着“第二个文艺批示”的传达，伙同康生随意批判《早春二月》等数十部“封资修”电影、戏剧，并把茅盾、夏衍等文化部六位正副部长拉下马，而是这两件事：一，经康生、张春桥协助，终于在上海搞成了对京剧《海瑞罢官》的影射批判，成为“文革”第一声；二，由于批《海瑞罢官》磕磕碰碰，又取得林彪支持，搞出了为“文革”鸣锣开道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王光美的这一看法非常有见地。正是这两件事，在历史上牵出了“文革”两大动力集团——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林彪为首的军事集团。而毛泽东以后多次说，江青对“文革”是有功的，大概首先也是着眼于她开了打破“文革”前政治僵局的这两炮。

◇ 刘少奇不知道《评〈海瑞罢官〉》的秘密策划

我问王光美：你们（刘少奇和“刘办”）完全不知道，江青在上海秘密策划批判《海瑞罢官》吗？姚文元在上海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罢〉》），长达八个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少领导都知道这事。

王光美的回答十分明确：“我们这里完全不知道。”

我再次提出问题：《评〈海罢〉》发表后，少奇还是不知道毛主席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发动“文革”么？

王光美回答得很干脆：“少奇他不知道。岂止他不知道，彭真就讲过，他也不知道。”

王光美对彭真的特殊身份作了说明：彭真那时不仅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他在总书记休息时，代总书记工作，不是有一句话么，相当于副书记。”彭真属于坐镇中央书记处的一线前沿人物，密切协助刘少奇、邓小平处理中央常务。

彭真不知道《评〈海罢〉》的策划与撰写，就等于中央一线及其前沿机构，都被毛泽东、江青蒙在鼓里了。这既说明《评〈海罢〉》的炮制过程十分神秘反常、完全瞒着中央领导集体；也说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确实没有对毛泽东采取“安装窃听器”、“安插特务”等秘密手段，反而习惯于使用既有的制度化程序（虽然这个程序并不完善）。其实，毛泽东也曾在1966年的十月会议承认：“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

王光美对我说：出现《海瑞罢官》这出戏，是因为“主席曾经亲自提倡海瑞精神。”“主席还说过，包公许多故事是传说的，真正的清官是海瑞，海南岛人。主席告诉胡乔木，应该写明史这一段。”“记得当时在上海或者在杭州，主席提出要看一次周信芳——上海‘麒麟童’的戏。

周信芳真排了。我们和主席就在上海的锦江小礼堂，看了周信芳演的京剧《海瑞背纤》。在北京呢，乔木告诉吴晗，主席讲了提倡海瑞精神的话。乔木还告诉吴晗应该怎么写……这个事就是这么个周折。”

王光美说，当吴晗编写的京剧《海瑞罢官》，1961年在北京上演后，毛泽东曾亲自夸奖：马连良演得好，吴晗写得

王光美感慨地对我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发展到批这个《海瑞罢官》。批判文章是江青在上海组织写的，主要找了上海市委的张春桥和上海《解放日报》的姚文元。从要批这个戏，到组稿，到刊登，我们都不知道，没有人来给‘北京’打招呼。彭真也不知道。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在上海《文汇报》刊登的。不光《解放日报》影响大，《文汇报》影响也大啊，《文汇报》相当于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那时已经非常敏感。所以，彭真来问过，来问，这怎么没经过中央？这么大的事！”

史料披露，当彭真获悉，连刘少奇也不知道江青组织撰写影射文章《评〈海罢〉》时，以十分惊人的勇气和持续性抗争，代表中央一线领导集体，进行了顽强抵制。

但是，彭真是否知道《评〈海罢〉》的幕后总指挥是毛泽东呢？

史料记载：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后，江青就要求陆定一等人批判《海瑞罢官》，被陆当场拒绝。1964年，毛泽东亲自把《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三十九个《文学艺术资料》，批发至县团级，却因中央一线没有布置批判而作罢。吴晗于1964年应周恩来要求，写正式报告说明《海瑞罢官》绝无影射意图。当《评〈海罢〉》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后，陆定一认为，此文牵强附会联系七千人大会后的“单干风”、“翻案风”，有挑起事端之嫌，支持彭真抵制。彭真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陆为副组长。而吴晗是彭真在北京市的亲密下属。如果彭真对上述背景一无所知，简直荒唐。

何况《评〈海罢〉》临近发表，张春桥为了留后路，已向北京市委书记邓拓透过风。而毛泽东也在1965年9月“点”过彭真：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更重要的是，毛于《评〈海罢〉》发表后两天，即离京赴沪，于11月17日抵沪，以坐镇沪上的姿态，亮明了他对《评〈海罢〉》的支持态度（毛在沪丝毫不曾批评姚文元）。如果彭真至此仍看不出《评〈海罢〉》后面站着“伟大领袖”，是不能想象的。

可以说，由于《评〈海罢〉》违反中央既有规定，点名批判著名爱国学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以诬陷手法挑起重大政治争端，而毛又未对此事进行解释，彭真等人便把《评〈海罢〉》“视为”与毛无关，进行着“合法”抵制。

如果彭真至此不能明白毛的态度，毛对彭、陆命令中央和北京各大报，不要转载上海地方的文章，就无必要大发雷霆，指责中宣部、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本人曾多次强调，他的愤怒源于：“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

如果毛泽东在《评〈海罢〉》发表后，仍不想让彭真等人知道他对《评〈海罢〉》的支持，他就不必在沪观望中央一线的反应长达两周，更不会允许江青在上海打电话质问林默涵：“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怎么样？”

历史地看，毛泽东批准发表《评〈海罢〉》，是企图挑起一场政治批判，藉此扭转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等人否定“三面红旗”的“修正主义”路线，并杜绝翻庐山会议的案（对彭德怀

的批判罢官，导致两三千万人饿死，已成毛的心病），以触动“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的大“整风”，重新确立毛的旗帜与地位。如果中央一线顺从，“整风”就和缓些，否则就激烈些。总之，毛泽东绝非在发表《评〈海罢〉》时，就已考虑发动惊天动地的、“自下而上”的“文革”。

◇ “文革来了以后，才有文革的”

王光美喃喃地说了两遍：“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文革’是怎么搞出来的。确实不知道……”

王光美并向我强调：“少奇他也完全不知道，《评〈海瑞罢官〉》就是‘文革’的导火线。”

我冒昧地再次追问：少奇应该多少知道文革要爆发吧？

王光美的口气十分肯定：“少奇他不会知道的呀。‘文革’来了以后，才有‘文革’的。”王光美的意思也是，“文革”并非是预先酝酿好的一场运动，而是突然发生的历史事件。

可以说，火山爆发一般的“文革”，是由很大偶然性与很大必然性碰撞，才形成的特殊事件。

对于彭真公开抵制《评〈海罢〉》，而于1966年制定的《二月提纲》，王光美告诉我：“《二月提纲》，是少奇主持中央常委会议通过，彭真又请示主席同意后，由中央批发给全党执行的。”

史料记载：当《评〈海罢〉》运用诬陷造谣，把批判之火引向“党内走资派”及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毛泽东又进一步挑明：《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政治翻案时，彭真一边同意转载《评〈海罢〉》，一边在《二月提纲》中针锋相对地提出：“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彭真并因吴晗惧怕《评〈海罢〉》有来头，当众发话：“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容许反批评的自由。”

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常委会议（刘、周、邓出席），一致通过《二月提纲》，并明确表态，此次“学术讨论”不要涉及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武汉获知，中央常委已通过《二月提纲》，并认定《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被迫做出退让。毛对彭真说：“‘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急忙说：“是毛主席的发明权。”毛再次说：“是你康生的发明权。”

由于毛没有反对《二月提纲》，刘、周、邓等在京常委讨论或传阅彭真所拟批语后，立即以中央名义批发此件（刘对彭掌握的《评〈海罢〉》背景了解多少，现在已难弄清。但由邓正式签发《二月提纲》与彭拟批语的2月12日，刘主持了在京常委会议）。正当姚文元惶惶不可终日之时，彭真认为“法定”程序已压住风波、分清是非，轻松地对各方面说：“问题解决了”，并公然追究：“‘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

然而，事态的发展大大出乎中央一线的估计。

毛泽东决不能让“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专政”。江青在毛支持下，迅速开辟新战场，再次射出猛炮——与《二月提纲》大唱对台戏的《纪要》，表露了毛发动文革的决心。

我请教王光美：是否可以说，是彭真等人对《评〈海罢〉》的有力抵制，导致毛泽东临时决定，把一场政治批判与大“整风”（毛、刘在文革初期都用过“整风”提法），升级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

王光美的回答具有多重意义：“‘文革’是怎么在1966年突然发动的，你们可以仔细研究。形成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一种‘文革’，确实是多种因素叠加促成的。除了《二月提纲》和《评〈海瑞罢官〉》的对立，还有聂元梓大字报的问世、派工作组的争执等等。当然，阶级斗争学说是个基础。而七千人大会，也早给‘文革’埋下了伏笔。”

王光美说：“我经历的这些事，都可以对你说一说。你要利用年轻、对党史熟，多看一些资料，深入了解那段历史。这样，你对我说的这些事，你就能看明白了。”

采访王光美之后，我看到一些资料，颇能说明问题，摘录如下：

彭真生前透露：“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彭真说，关于这件事的原因，他不能讲。彭真至死也未说出这个历史秘密。

胡乔木也说：“如果没有这篇文章（作者注：指《评〈海罢〉》），究竟要不要搞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又不登，就把他的火煽起来了。在没有这件事以前，他头脑里并没有这些东西。”

毛泽东于1966年夏也说过：“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

◇ “文革”发动于刘少奇出国之际

王光美对我说：与彭真起草《二月提纲》同步，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以林彪委托的名义，搞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纪要和题目，是陈伯达修改的。陈伯达是秀才。”（笔者注：《纪要》曾经毛泽东及其政治秘书陈伯达多次修改；题目则为毛定。）

王光美说：“江青搞的这个《纪要》，把全国文艺界都否定了，说建国十六年来，是一条黑线在专政，现在必须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夺回被黑线占领的阵地。这样，政治上的问题，就比批《海瑞罢官》的时候大多了。批《海瑞罢官》批不下去，就是因为黑线专政。”

我补充道：毛泽东还针对彭真谈党性，在《纪要》上增写了一段打破“框框”的话：“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

王光美一边回忆，一边接着说：“后来，就在全党发《纪要》；又批彭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但是，我们那时已经出访了。回国以后，我看到一些简报，是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少奇出访前，主席曾经在杭州对少奇、总理、彭真谈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但是没有处理彭真的迹象。”

据王光美介绍，她陪同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等三国，时在1966年3月22日到4月19日。这段时间，国内发生的许多重大事情，刘少奇一概不知。

正是刘少奇出访的这二十八天，中国历史进程发生了巨变，以政治“清洗”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并非彭真曾用语“文化革命”），被毛泽东初次提出。而刘当时是中央唯一敢于批评、反对毛的人。

请看这个时间表：

1966年3月22日，国防部长林彪，致信中央军委各常委，要求通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的《纪要》。

3月30日，中央军委将《纪要》报送毛泽东与中央审批。

3月28日—30日，毛严厉批判《二月提纲》，赫然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并首次提出中国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4月1日，毛在《纪要》上批示：“已阅，同意。”

4月10日，《纪要》由中央下发全国。

4月12日，陈伯达起草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4月14日—17日，毛三次修改《五一六通知》，并增写震惊全国的话：《二月提纲》“模糊了……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夺取政权”，应立即“清洗这些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

4月22日，毛泽东在早已召开一周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刘少奇的面说：“吴晗……朝里有人”，必须发动‘文革’。刚回国的刘，被迫接受既定事实。

5月16日，刘少奇由康生监督，主持仅有在京七十六人（包括非中委；而健在的中委、候补中委约一百六十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即将失去自由的彭真，抓紧最后机会向刘、周提出，删除“赫鲁晓夫……”那句主要是暗指刘的话，但已无可能。刘少奇在郭沫若建议修改语法也被拒绝后（康生表示：主席定的稿一个字不能动），意味深长地说：“连几个字也不让改，这不是专断独行么？……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那就不改吧。”

于是，“文革”由“文革”的第一主攻对象——刘少奇自己拉开了正幕。

可是，王光美坚持对我说：直到1966年8月，毛泽东印发《炮打司令部》之前，刘少奇一直不能确定，“中国赫鲁晓夫”的帽子会真正落到他头上。虽然刘早已觉察毛对他不满（1964年底，毛、刘就有严重争执，毛就说过中央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但毛随即又对大家说：你们今后还是要听刘的话哟！）。

刘少奇这样看待他在“文革”初期的命运，主要是因为《五一六通知》下达后，他仍然以一线决策者身份出现在各处，一线机制仍然在毛泽东许可下照常运转。刘同时认为，把他定为“错误路线”的“司令”，将很难使全国保持稳定。

“对主席公开号召‘炮打司令部’，少奇没有精神准备。因为当时还是毛、刘、周、朱……这样排名的中央。是主席在退居二线时，让少奇为首的。少奇做工作时，重大问题还是通过主席的。”王光美对我说，“少奇一直认为，他在一线为首时那样决策，那样处理各种问题，包括后来反对‘文革’大乱，目的是让中国稳定和繁荣，可以逐步建成现代化强国，他认为，主席应该理解这一点。”

可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非常不同。正如王光美所说，自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提出务实路线，随即又提出：“‘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等等以来，毛、刘裂痕日益加深。

毛泽东愈来愈不能容忍一线“自行其是”，“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毛泽东愈来愈痛恨“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讲了多少年了”，“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的失落局面。所以，他觉得，“需要夺权”，“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

而党内对一、二线领导人的权限与决策程序，从来没有制度化的条文规定。中国又缺乏对两种不同政治见解合法制衡、合理化解的政治机制。在个人崇拜盛行、宪政民主法治不健全、民众没有知情权、极左文化占上风的背景下，一场把中国引向十年重灾的“文革”，就这么仓促、不可阻挡地出台了。“文革”浩劫中，数亿生灵涂炭。

“文革”结束三十年后，倾听王光美讲述历史，回顾“文革”爆发的曲折过程，使人不禁想到，邓小平说：改革开放道路的主要特点，已经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从“文革”的教训中得到了基本总结。说得多么深刻与中肯！

□ 原载《领导者》杂志

~~~~~

# 【研究动态】

首部文革通史还原最后的毛泽东  
——专访《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作者麦克法夸尔、沈迈克

· 张楠 · 迪扬 ·

作为首部文革通史，《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对文革所有重要事件进行了以“天”为单位的追踪，而新材料的出现揭开西方文革研究的诸多盲区，在细节上成功展现毛泽东个人特质中的复杂和矛盾。

写文革史不难，写文革通史很难。这是丁学良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序言中写到的。由于文革最主要的领导者、牺牲者、幸存者毛泽东、刘少奇、彭真、周恩来等均没有留下回忆录，而且大批中共档案尚未解密，多年来几乎没有人敢碰这个烫手山芋。但是，月前《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文版与读者见面了。全书翔实地介绍了文化大革命所有重要事件的过程，对历史细节进行了以“天”为单位的追踪。这是迄今为止学术界首部文革通史。

新书中文版面世，两位作者首次在中国会合是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零九年举办的“新中国建国史学术研讨会”。麦克法夸尔承袭着他一以贯之的政客风格：睿智、老练，精心考究着每句貌似脱口而出的话；沈迈克表面沉静、寡语，实际上十分健谈，额头上层层深嵌的皱纹仿佛是他穷其大半生精力研究现、当代中国史的见证。

谈起《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撰述提议和写作过程，两位作者仍兴奋有余。一九八八年，沈迈克得到了加入哈佛大学博士后项目目标机会。在这两年中，他对中文的精通程度，对文革史的熟悉和热衷程度给时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麦克法夸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快，沈迈克得到了在其家乡名校瑞典隆得大学任教的机会。正在他带着欣喜地要开始自己崭新的教学、研究生涯时，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同哈佛大学的缘份还远未了结。一天，电话的另一端响起了麦克法夸尔的声音：“迈克，回哈佛我们一起写文革史吧？我这里有笔研究资金。”承蒙学术老前辈的看重，以及难得的资金支持，沈迈克丝毫没有犹豫，当即接受了邀请。

于是，两人便开始了“你写一章，我改一章；我写一章，你改一章”的合作方式。沈迈克

说：“麦克法夸尔和我虽然一老、一少；一个英国人、一个瑞典人；一个在美国社会科学气息浓厚的政府学系，一个在渗透着欧陆人文关怀的中文系，但是我们的治学理念非常一致。麦克法夸尔不喜欢政治科学量化式的研究方法，极其反感连事实都没搞清楚，就拿现成理论往上套的做法，因而我们的书采用的是传统的历史治学方式，首先把故事讲清楚。”

从写作策划到最后出版，《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耗时十余载。这是两位作者始料未及的。“我们一九九二年和哈佛大学出版社签合同太乐观了。本来打算一九九四年就交稿的，但是后来发现不可能。”沈迈克直言不讳撰写过程中的曲折：“那个时候麦克法夸尔正在写他的文革三部曲第三卷，基本上没有太多时间参与写作。我们也没料到这部书会写这么长时间。”

一九九二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民间旧书资料市场。任何平民百姓都可以翻家底，把存在家里的旧书、旧报、旧杂志找出来摆个小摊，在街上贩卖。北京潘家园的旧书市场是北京当时这类资料的集中地。九十年代初，虽然这个市场才初具规模，但已足以令沈迈克兴奋不已。

#### ◇ 潘家园改写文革史

沈迈克说：“我当时在北京大学，北大历史系的教授对我说『迈克，你知道潘家园的旧书市场吗？肯定有好多你喜欢的东西。』”听罢他便直奔位于朝阳区的潘家园。这并不是把每本书进行明码标价的旧书二手市场，而是把旧数据按重量进行低价兜售。正是这菜场式的旧资料市场令沈迈克如获至宝。沈迈克说：“我一次就买了二、三十公斤的资料。旧书市场的出现意味着许多有别于官方解释的史料浮出水面。没想到中国政府的一个政策立刻让我们的书有了这么多丰富而宝贵的一手资料。”中国政府开放旧书自由市场的政策，让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正在书写的文革史翻天覆地。

与哈佛大学签约之际，麦克法夸尔本想将此书写成大事记，只是简单记录文革每一天都发生了什么事，篇幅最多两、三百页。但是一九九二年之后，新材料层出不穷，令两位作者兴奋不已。于是，最初的大事记变成了如今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故事书。比如书中有关“五·一六阴谋”、“一打三反”、“个人崇拜”的篇章原本是没有的，但是随着新材料不断出现，这些章节都得到了材料的有效支持。沈迈克趣言：“当时我们甚至希望不要再出新材料了，不然我们的书就写不完了。结果，第二年又出了新东西。”

新材料的出现帮助两位作者揭开了西方文革史研究的诸多盲区。沈迈克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西方文革研究者几乎不知道“五·一六阴谋”。随意翻开《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只有极少量的文章提到这个事件，提到的人也基本上也没弄明白。新材料被发掘后，“五·一六阴谋”首次在西方文革史上大白于天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对这场被忽视已久的“五·一六阴谋”做了白描式的叙述。

这种白描式的写作方式贯穿全书始终。整本书读起来很轻松：情节环环相扣，心理揣测紧张异常，政治斗争气氛直逼胸臆。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写作方式。沈迈克一再强调：“《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一本严谨的历史学术著作。不论此书写作方式如何轻松、愉快，那仅仅是一种写作方式。”稍微留意细节读者就会发现，全书所有材料都有明确的出处。对于有着多种出处，且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事件，两位作者选择提供多种解释。比如，“赵永夫事件”，两位作者发现材料中军方解释和民间解释完全不同，本着审慎治学的态度，作者将两种解释并置，不同材料的可信度则交由读者自行判断。沈迈克说：“这是我们这本书与中国大陆流行纪实文学的最大不同。纪实文学可能有事实依据，但是那毕竟是文学。有时候，作者会为了把书写得好看而刻意扭曲历史原貌。这是我们这本书绝对杜绝的。”

为文革撰写通史，这不仅体现了两位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更彰显了一种大手笔的气魄和胆量。但即便如此，两位作者仍然对给文革下定义、给毛评功过持谨慎态度。对于细致的历史学研究，“一语定乾坤”是一种近乎鲁莽和不负责任的态度。

沈迈克说：“毛泽东是非常复杂的人物，说到底，他依然是一个谜。”沈迈克说：“六六年到六七年，毛对文革基本上控制得很好，可以说步步为营。但是之后就没有那么细致的掌控了。他希望控制身边的人，但是有时候又任凭事态乱下去，因为他相信『总会乱出个道理』。”虽然毛泽东周围的人也很复杂，如周恩来、康生。但这些人的复杂都表现在他们施展浑身解数猜测主席意图上。毛泽东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能复杂过他。

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都希望《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能成功地为读者在细节上展现毛泽东个人特质中的复杂和矛盾。

巨著出炉，两位作者都十分期待中国读者的反应。麦克法夸尔希望自己在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生能通过阅读此书，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有更加完备的了解；沈迈克则期待着中国大陆文革研究专家的点评。“毫无疑问，世界范围的文革研究权威在中国大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不能自由发表见解、著作，但是通过过去多年来和他们的接触，我深深受益。”沈迈克坦言老外研究文革毕竟有隔膜，很多乍一听反逻辑的事情都曾真实发生，若非经中国专家点拨，他很难理解中国政治运作的复杂逻辑。

#### ◇ 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

如今，艰辛的写作过程已成往事，两位作者对这部文革通史充满信心。“这本书将是既有叙述方式下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文革通史”。此言一出，沈迈克眼神里透着不可撼动的坚定。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采用的是经典文革史研究叙述方式，即以“文汇报”、“五·一六”、“接见红卫兵”、“林彪事件”、“批林批孔”等文革期间主要事件为线索进行叙述。这是史学界以冷战为背景的叙述视角。

沈迈克指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后冷战时期，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我希望十年后人们再写文革，将采用全新叙述方式，能以完全不同的视角为主线，穿起文革期间发生的诸多事件。这才是有震撼力的贡献。如若十年之后的著作还不能突破我们这种叙述方式，即便再有新材料出现，也只能给我们做脚注！”

#### □ 《亚洲周刊》二〇一〇年第九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